政策因素与职业使命感对职前教师身份认同的影响

周广亚，龚钰淇
安阳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DOI: 10.61369/SDME.2025310023

摘　　要： 为探讨教育政策因素、职业使命感对职前教师身份认同的影响，并检验家人支持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对象为河南省四地市的800名公费师范生，采用整群抽样方式选取。结果表明：教育政策、职业使命与身份认同之间关系密切；职业使命在支持政策与身份认同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限制性政策与身份认同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支持性政策条件下，家人支持对职业使命的调节作用显著，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关 键 词： 职前教师；身份认同；教育政策；职业使命感；家人支持

The Impact of Policy Factors and Professional Calling on Pre-servi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Zhou Guangya, Gong Yuqi
School of Education,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yang, Henan 455000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policy factors and professional calling on pre-servi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o verif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support in this process, this study adop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800 tuition-free normal students from four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selected by cluster samp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close relationships among educational policies, professional calling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professional calling plays a ful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upportive policie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estrictive policie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upportive policies, family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professional calling, and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s valid.

Keywords: pre-servi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educational policies; professional calling; family support

2018年，教育部将实行多年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调整为“公费教育政策”，地方层面的培养计划也随之统一了名称。公费师范生在读期间，正是其教师职业身份与理想信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公费师范生对政策的接受与认同程度，是未来对其教育政策进行优化和调整的重要现实依据。封子奇、姜宇、杜艳婷和高钦[1]研究发现，政策了解和政策收益影响教师身份认同，国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费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认同。研究显示教育政策满意度越高，师范生的身份认同越高。政策满意度反映师范生对教育政策的接纳态度，公费师范生对教育政策的满意度既能直接影响教师身份认同，也能培养师范生的从教动机进而促进其身份认同的发展[2]。

尽管支持性政策为师范生职业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但政策的限制性要求与师范生毕业择业时的自由选择需求仍存在矛盾[3]。此时，家庭支持和父母支持程度就会发生作用，比如，家庭支持和父母支持程度越高的个体越容易做出职业决策[4]。

职业使命感（career calling）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是指“一种源于自身并超越自我的超然召唤，即以一种能展现或获得目的感或意义感以及以他人导向的价值观和目标作为基本动机来源的方式去践行特定生命角色。”[5]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说。教师职业常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孺子牛”和“人梯”。正因如此，职业使命感构成了其不容忽视的内在要求与突出特征。国外系列实证研究也表明，当个体对某职业持有使命感时，他们会高度认可该职业并认为他们的职业是重要、有意义的，因此他们会积极投入到相关的职业活动之中[6-7]。大学是职业准备的关键阶段。为获得践行使命所需的能力，学生往往会更积极地投身于相关的职业准备活动中。另外，来自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显示，具有职业使命感的大学生常常表现出更强的目的感、更强的职业计划性以及认识到当前学习与未来职业的相关性[8]。

职业使命感的源泉具有二元性：它既可能响应于外在的社会期许与需求，也可能根植于内在的自我实现与真实追求。从社会环境层面看，个体的社会网络关系对于职业使命感的影响应该是

项目信息：
202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23-ZDGH-604）研究成果。
2022年河南省哲社规划项目（2022BJY001）部分成果。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非常深刻的[9]，包括国家政策和家庭关系，而个体最亲密的关系无疑是家庭关系。本研究旨在探讨教育政策、职业使命感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关系中，家人支持作为一个关键的环境因素与资源，通过提供外在鼓励与内在价值认同，对个体的职业使命感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家人支持也为个体将国家政策要求内化为个人职业使命感提供了重要的外部转化环境。基于此，家人支持的程度可能在这一复杂关系中扮演调节变量的角色，即调节教育政策对职业使命感及身份认同的影响过程（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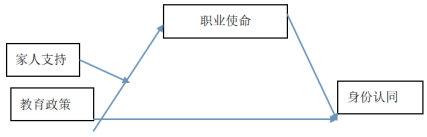

图 1 教育政策、职业使命、家人支持与身份认同关系的假设模型

一、方法

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了 H 省 4 所地方高校的公费师范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612份，有效回收率为76.5%。样本覆盖了 H 省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具有较好的地域代表性。被试的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详见表1。

表1 人口统计学变量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层次	本科	410	67%	是否调剂	是	51	8.4%
	专科	202	33%		否	561	91.6%
年级	一年级	213	34.8%	性别	男	63	10.3%
	二年级	207	33.8%		女	470	76.8%
	三年级	192	31.4%		缺失	79	12.9%

2. 工具

（1）职前教师身份认同量表　本研究采用修订版的《职前教师身份认同量表》。以 Friesen 和 Besley[10] 编制的职前教师身份认同量表为基础，对该量表进行翻译和回译，并参考了前人有关教师身份认同问卷的项目，进行了职前教师身份认同量表的初步修订。该量表包含四个维度：教师参与、自我归类、教育效能、意志行为，共计18个项目。量表采用 Likert 5点计分法（1= 完全不同意，5= 完全同意），总分越高，代表身份认同水平越高[11]。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

（2）政策满意度问卷　以2016年以来 H 省教育厅颁布的《小学教育专业全科教师管理办法》（试行）、《H 省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等相关政策为依据，专门设计了《公费教育政策满意度问卷》。问卷将研究中涉及的11项具体政策转化为11个对应项目，要求被试评价对每项政策的满意程度。 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方式（1 =“非常不满意”，6 =“非常满意”），总分越高代表对政策的总体满意度越高。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问卷结构清晰地分为两个维度，即支持性政策满意度、限制性政策满意度。

（3）职业使命感量表 使用李飞飞[12] 编制的师范生教师职业使命感问卷，该问卷由9个题目。使用里克特7点记分，总量表的信度系数0.93。

（4）家人支持问卷　本研究采用单项目测量法来评估“家人支持”这一变量，具体项目为：“家人对您职业目标的支持程度”。采用李克特9点计分（1分代表支持程度最低，9分代表支持程度最高），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其感知到的家人支持程度越强。

3. 施测步骤以及数据处理

按照班级进行集体施测，主试应依照统一指导语予以说明作答要求，被试应现场完成作答并由主试统一回收，基于 SPSS22.0 和 Amos19. 0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结果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对所有变量的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6个，且首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5.38%，低于40% 的临界标准。这一结果表明，本研究数据中教育政策、职业使命感与身份认同等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适合进行后续的检验分析。

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结果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政策、职业使命、家人支持与身份认同之间都显著正相关。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结果

	M ± SD	支持政策	限制政策	职业使命	身份认同	家人支持
支持政策	5.15 ± .76	1				
限制政策	4.07 ± 1.29	.619**	1			
职业使命	3.90 ± .74	.467**	.489**	1		
身份认同	3.65 ± .55	.384**	.418**	.748**	1	
家人支持	7.94 ± 1.30	.297**	.297**	.320**	.280**	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 职业使命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检验职业使命在教育政策与身份认同间的中介作用，以支持政策和限制政策为自变量、职业使命为中介变量、身份认同为因变量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采用 AMOS22.0 进行模型检验，检验结果如图 2 和表3、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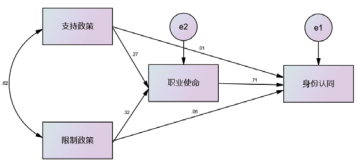

图 2 职业使命在教育政策与身份认同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表3 模型拟合指数汇总表

χ^2/df	TLI	CFI	GFI	NFI	IFI	RFI	SRMR	RMSEA
2.157	.946	.968	.966	.939	.972	.918	0.018	.027

表4 职业使命在政策认知和身份认同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效应值	SE	p	95%CI
直接路径1	支持政策→身份认同	0.03	0.022	0.151	−0.012–0.074
直接路径2	限制政策→身份认同	0.03	0.013	0.025	0.004–0.054
间接路径1	支持政策→职业使命→身份认同	0.24	0.022	0.000	0.205–0.290
间接路径2	限制政策→职业使命→身份认同	0.15	0.015	0.000	0.119–0.177

由表4可知，支持性政策对身份认同无显著直接效应，其影响完全通过职业使命感的中介路径实现；而限制性政策对身份认同则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职业使命感在其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由于教育政策对于职业使命的作用是有边界条件的，教育政策的积极作用受家人支持的影响，我们进行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见表5、6。

表5 家人支持对支持政策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职业使命				身份认同			
变量	β	SE	t	p	β	SE	t	p
constant	0.327	0.246	1.332	0.184	0.149	0.188	0.795	0.427
性别	−0.017	0.117	−0.145	0.885	−0.027	0.089	−0.306	0.760
年级	−0.222	0.077	−2.880	0.004	−0.063	0.059	−1.063	0.288
Z 支持政策	0.412	0.040	10.387	0.000	0.048	0.032	1.513	0.131
Z 家人支持	0.186	0.040	4.647	0.000				
职业使命					0.690	0.033	21.189	0.000
Int_1	0.076	0.033	2.320	0.021				
R^2	0.267				0.548			
F	38.287				160.004			

由表9可知，家人支持在支持性政策与职业使命间起调节作用，bootstrap 检验表明（见表6），调节作用显著。由图3可知，这种调节作用对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明显，只有家人支持力度强的时候，教育政策才能更好发挥积极的作用。

表6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 bootstrap 检验

Z 家人支持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M−1SD	0.2314	.0345	.1647	.3029
M	0.2843	.0324	.2227	.3497
M+1SD	0.3275	.0438	.2423	.4136

图 3 家人支持在支持政策与职业使命间的调节作用图

由表7可知，家人支持在限制性政策与职业使命间调节作用不显著。但不同家人支持水平下，职业使命在限制政策满意度与身份认同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

表7家人支持对限制政策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职业使命				身份认同			
变量	β	SE	t	p	β	SE	t	p
constant	0.291	0.244	1.193	0.233	0.135	0.187	0.723	0.470
性别	−0.020	0.116	−0.169	0.866	−0.029	0.088	−0.327	0.744
年级	−0.184	0.077	−2.389	0.017	−0.051	0.059	−0.860	0.390
限制政策	0.430	0.040	10.897	0.000	0.086	0.033	2.622	0.009
Z 家人支	0.162	0.042	3.879	0.000				
职业使命					0.671	0.033	20.367	0.000
Int_1	0.029	0.037	0.779	0.436				
R^2	0.279				0.551			
F	40.7504				162.529			

三、讨论

相关分析表明，教育政策、家人支持、职业使命与职前教师身份认同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表明，支持性政策对身份认同的直接作用不显著，限制性政策对身份认同的直接作用显著，但两者都通过职业使命对身份认同产生影响。Mockler[13] 认为，教师通过教师工作相关政策的发展变化形成对政策环境的理解和态度，并影响教师的身份认同。本研究揭示了支持性政策与限制性政策对教师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公费师范生政策的推行，其支持性措施（如待遇保障）已广为人知，且近年来政策在这方面保持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意味着，提升身份认同更需要依赖公费师范生的内部驱动力。相比之下，限制性政策（如服务年限、违约责任）因其明确的约束性，能更直接地作用于个体的职业选择与认同。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应注重协调支持性政策与限制性政策的关系，政策设计需紧紧围绕核心目标，确保不同性质的条款能够相互协同、形成合力，避免因政策内在张力削弱整体实施效果。相关高校需加强对国家政策的系统宣讲与深度解读，应引导公费师范生全面、辩证地理解政策初衷，正确认识个人享有的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从而促进其将外部政策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职业认同与发展动力。

Hirschi 的研究发现，拥有职业使命感的大学生同时会有职业认同的达成状态 [14]。本研究证实，职业使命感是影响公费师范生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这一发现为教育管理者提供了明确启示：应系统性地激发和培养公费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使命感，通过有组织的反思活动，帮助学生深入审视选择师范专业的初心，厘清个人职业选择的内在动机与真实想法，促进其职业承诺的内化。

在家庭关系中，与父母双方亲近的大学生拥有更高的职业使命感，家庭关系可能对于职业使命感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Ireland 和 Lent[15] 研究发现， 拥有更强社会支持的大学生更容易从外界获取学习经验， 拥有更高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和职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业结果预期、更明确的职业目标。本研究揭示了教育政策（特别是其不同性质）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阐明了外在政策如何通过影响个体的职业使命感，最终作用于其教师身份认同。基于此，教育政策设计应着眼于培养和激发师范生的职业使命感与身份认同建议遵循“多支持鼓励、少限制惩罚”的原则，并积极争取家长的支持与认可，以避免因限制性条款过强而削弱或破坏师范生的身份认同。

四、结论

1. 教育政策、职业使命与身份认同之间关系密切。支持性政策对身份认同的直接作用不显著，限制性政策对身份认同的直接作用显著，职业使命感对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

2. 职业使命在支持政策与身份认同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限制性政策与身份认同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支持性政策条件下，家人支持对职业使命的调节作用显著，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也就是说，有了家人的支持，支持性政策能更好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封子奇 . 免费师范生教师职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0,12(7):69 - 75.

[2] 赵宏玉 , 张晓辉 . 教育政策对免费师范生从教动机、职业认同的影响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4): 51 - 59.

[3] 王智超，杨颖秀. 地方免费师范生：政策分析及现状调查 [J]. 教育研究，2018，(5)：76-82.

[4] Dahling, J. J., & Thompson, M. N. . Contextual supports and barriers to academic choices: A policy-capturing analysi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10, 77(3):374 - 382.

[5] Dik, B. J., & Duffy, R. D. Calling and vocation at work: Definitions and prospect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2009, 37(3), 424-450.

[6] Dobrow, S. R., & Tosti-Kharas, J. Ca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cale measure[J]. Personnel Psychology.2011,64(4): 1001-1049.

[7] Hirschi, A. Callings and work engagement: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work meaningfulnes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nd occupational self-efficacy[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12,59(3):479-485.

[8] Duffy, R. D., & Dik, B. J. Research on calling: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where are we going?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3,83(3): 428-436.

[9] 田喜洲，谢晋宇，吴孔珍. 倾听内心的声音：职业生涯中的呼唤研究进展探析 [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34(1) : 27-35.

[10] Friesen, M. D. & Besley, S. C.. Teacher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year of teacher education: A develop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3, 36,23 - 32.

[11] 周广亚，王明辉，王恩国. 职前小学教师身份认同与生活、学习满意度的关系：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 [J]. 心理研究，2022，15 (3)：276-281.

[12] 李飞飞 . 师范生教师职业使命感问卷的编制及应用 [D].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2016

[13] Mockler, N.. Beyond ‘what works': Understanding teacher identity as a practical and political tool[J]. Teachers and Teaching. 2011, 17(5):517 - 552.

[14] Hirschi A. Callings in career: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es sential and optional component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1, 79(1): 60-73.

[15] Ireland, G. W., & Lent, R. W.. Career explor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A test of the career self-management model[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8 ,106:37 - 47.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